

【历史研究】

三国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嬗变

樊 宁

摘 要:三国历史和故事在日本大化改革时期传入日本,多为史料的翻译,江户时期加入了更多文学内容,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三国文化,随后三国文化又增加了更具多样化的影视文学与文化产业等内容。经日本文化融合的三国文化虽已脱离其原始形态,不断嬗变,但在文化思想及美学层面却依旧与中国的三国文化密不可分。

关键词:日本三国文化;三国文化;《三国演义》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8-0131-07

目前三国文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文学意义方面的探讨,以沈伯俊与段江丽的讨论介绍最为详尽^①。此外,在史学研究方面,则大多关注三国历史的评介或依据文学典籍对文献记录与真实历史事件间的比较研究^②,三国文化的概念也在讨论之中逐渐成为涵盖文学、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重要问题。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来看,对三国文化在国内发展变化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其在海外传播方面关注不多,本文拟对三国文化的内涵、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嬗变展开探讨,以期对三国文化在日本的演变规律及思想特征有所总结。

一、三国文化的内涵及演变

三国文化的内涵较为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沈伯俊先生将三国文化内涵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③,关注的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第二个层面称为“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的‘三国文化’观)”^④,关注的是三国时期的精神与物质文化总和。第三个层面为“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⑤,关注的是以三国历史及三国故事为源头所衍生出的各类综合

文化现象。综合而言,三国文化的概念应是关注以《三国志》为史实源头,以《三国演义》为文学载体,在两者基础上所衍生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包括史学、文学、戏曲、风俗信仰等。

三国文化最早以西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作为载体,至隋、唐、宋、元时期以诗词、戏曲为载体,元末明初以后,三国文化与民间风俗信仰结合,内容更为丰富,现代以来,伴随着电媒技术的发展,三国文化又以影视、电子等为载体,形成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国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三国历史和故事多以史学著作作为主,可称之为三国文化的形成期。自西晋开始,三国历史便不断被记录在各类史书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志》,陈寿在《三国志》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此外,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也对东汉至西晋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记录,“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帝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焉”^⑥。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也记载了有关三国历史的部分事件,《后汉书》中选取的三国历史事件虽较为有限,但却对皇甫嵩、董卓等人物做了详细记录。这三部著作,成为三国文化发展的基础文献。

收稿日期:2021-01-15

作者简介:樊宁,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第二个时期为隋、唐、宋、元时期。这一时期的三国文化主要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可称之为三国文化的发展期。隋唐时期的三国文化主要以诗歌形式表现,如李白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对三国群雄争霸历史描绘道:“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⑦杜牧在《赤壁》中对三国历史叙述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⑧刘禹锡在《蜀先生庙》中对三国历史评价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⑨此时期三国文化不仅丰富了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历史叙事题材,还增强了文人诗歌中对自我经历悲凉情怀的表达效果。诗人对三国历史事件的关注,也丰富了三国历史的文学表达形式,扩大了三国故事的传播范围,对三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元时期三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以话本、词赋、戏曲等形式呈现,跳出了三国故事的历史叙事方式,向市民文化方面发展。如《三国志平话》讲述了“汉高祖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三国并收,独霸天下”等故事情节。^⑩《三国志平话》在史实的基础上,以生动化的口语形式促进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丰富了三国文化的文学传播形式。在词赋方面,苏轼在创作中更是多次借用三国典故,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⑪。《前赤壁赋》中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⑫。戏曲艺术方面,宋代出现了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戏曲类作品,如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中记载:“宋朝仁宗,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⑬宋末元初还出现了根据三国历史进行创作的杂剧类戏曲作品,如关汉卿在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对关云长的刻画:“关云长千里独行觅二友,匹马单刀镇九州,人似巴山越岭彪,马跨翻江混海兽。”^⑭三国历史和故事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丰富了三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扩大了三国文化的传播范围,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为三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时期为元末明初至今。这一时期的三国文化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首先是对《三国演义》展开续写的小说及戏曲

类作品,如酉阳野史的小说《续三国演义》,徐渭的戏曲《狂鼓史渔阳三弄》等。其次,三国故事也促进了明清书评类文学作品的发展。其中较为有名的应属明代万历年间李卓吾的点评版及明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的点评版。李卓吾点评版注重从社会政治方面对三国历史展开述评,沈伯俊先生指出:“其批评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道德的评价,而较少致力于文学的批评。”^⑮毛版点评本则注重从文学方面对三国历史事件进行述评,尤其关注对三国人物形象的评论,如“黄盖苦肉之计,苟非黄盖之所自愿,此岂周瑜之所能使哉”,“作者于此,不是写周瑜之智,正是写黄盖之忠;亦只是写黄盖之忠,不是写黄盖之智”。^⑯再次,明清以来,三国历史中的人物在民众生活中影响巨大,如关公,明清时期,民间逐渐兴起对关公的祭祀。李贽在《关王告文》中记载:“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关公之像,畏公之灵。”^⑰《帝京岁时纪胜》中也记载:“十里河关帝庙在广渠门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⑱最后,自现代以来,伴随电媒技术的发展,三国文化逐渐与影视文学结合,如1994年的电视剧《三国演义》,2008年至2009年根据三国故事改编的电影版《赤壁》等作品。这一时期的三国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可以说是三国文化的成熟期。

三国文化主要以戏曲、故事、词赋、影视为载体传播,逐渐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三国文化传入日本后,结合了日本文化的内容,产生了新的特点。

二、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嬗变

三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经多次吸收与改造后最终形成了日本的三国文化,按照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嬗变特点区分,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 大化改革至江户前期

这一时期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多以翻译为主。公元645年,日本大化改革运动开始,由于日本天皇对隋唐政治制度、语言及文化思想极其推崇,多次派遣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前往中国学习。《日本书纪》中记载:“留于唐之学者,皆学以有成,应唤。且大唐国者,法式备之珍国也,常须达。”^⑲遣唐使跟随儒学大师学习,又购买大量中国典籍,用商船载运回日本,据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⑳记

载有三国历史的书籍也在其中,如《晋书》就记载“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君讨权”^{②1}之类的历史内容。《三国志》大约在8世纪至12世纪期间传入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介绍道:“《三国志》六十五卷、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中大夫裴松之注。”^{②2}

三国历史的传入,对日本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14世纪左右,日本文学中军事物语类作品便出现了借三国故事展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属《太平记》。《太平记》主要讲述了日本镰仓幕府末年至室町幕府初近五十年间的历史。有关《太平记》的出版时间还存在争议,日本学者铃木登美惠在《太平记成立年代历考察》中认为“《太平记》是应安至永和年间,即1368年—1379年间成书”^{②3},日本学者重野安绎则认为《太平记》可能在1374年左右成书,根据《洞院公定日次记》记载:“近日风行天下《太平记》作者也。”^{②4}可推测《太平记》大致成书于1371至1374年间。在日本《太平记》中已清晰可见对三国典籍的引用,如“吴魏争天下,赤壁之战”^{②5}等。此外还有对三国人物的引用,如“天下之人惧卧龙之威,感其德皆来朝贡”^{②6}、“今俗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②7}等。可以说,日本大化改革时期,与三国历史相关的典籍如《三国志》等在日本的流传,不仅丰富了日本军事类物语小说的创作题材,还为后期三国文化在日本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2. 江户时期

江户时代《三国演义》传入日本,日本文学开始借鉴三国故事展开创作,这一时期可以认为是日本三国文化的发展期。

17世纪开始,日本文学进入近世文学时代(1603—1868年)。1600年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实行中央集权,《三国演义》大致也在此时传入日本。有关《三国演义》的传入时间仍存在争议,日本学者田尚子在其《三国志享受史论考》中认为《三国演义》的传入时间应在江户前期的安土桃山时代,即1568年至1600年。中村幸彦则认为《三国演义》的传入应在江户初期。但依据现存记录来看,1604年《林罗山先生集》的书尾附录阅读书单中,已对《三国演义》有所记载,如“《罗山先生诗集》在其末尾附录的读书目录有440部,其中便包含了《史记》、《汉书》、《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吴越春秋》、《通

俗演义三国志》”^{②8}等。《三国演义》传入日本后,日本文人开始对《三国演义》进行翻译和出版。如1622年江藤树翻译了部分《三国演义》内容,并刊登在《为人钞》^{②9}上,1691年自称湖南文山的学者将《三国演义》较为完整地翻译出来,并命名为《通俗三国志》。此外,据《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中记载:“1711年至1716年间,文人阶层兴起了学习唐朝语言的热潮,《三国演义》以语言教材的形式成为学习书籍之一。”并“促成了一批‘唐事通’对三国故事的译介行为”。^{③0}此时作为语言教材之一的《三国演义》不仅促进了三国文化在日本文人阶层的传播,还促进了其在日本僧院人士之间的传播。三国文化经日本文人的翻译与日本僧院人士的转述传播后逐渐影响了日本市民阶层。这表明,日本的三国文化首先是由日本文人接受并开始传播的,而《三国演义》的传入也推动了日本民间文学的世俗化进程。

三国文化在日本市民阶层的流传,对日本民间绘本文学影响较大。江户时代的绘本文学多以绘图为主,并配以简短文字。这一时期以三国故事为基础创作的绘本数量繁多,如1760年鸟居清满创作的《画解三国志》^{③1},1803年睦酒亭老人创作的《绘本三鼎倭孔明》^{③2}以及葛饰戴斗在1836年至1841年所作的《绘本通俗三国志》^{③3}等。上田望指出:“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民众对三国中的故事已较为熟悉,画家们改变了原有小说插图的形态,因此在日本出现了日式戴斗版的插图创作。”^{③4}葛饰戴斗是日本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徒弟,在葛饰戴斗的绘本中不仅有意增强了原版三国人物面部神态的夸张化表达形式,还将原版三国人物中的中国服饰改造成了带有日本民间花纹特征的服饰造型。此时期日本作家在保留三国故事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对三国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改造,将原版三国人物的形态改造为更符合日本审美的人物造型。

江户时代后期,《三国演义》逐渐脱离原有文本形态,以日本舞台戏曲歌舞伎与净琉璃等形式展现。井上泰山指出,早在“宝永6年,也就是公元1709年的事情,在大阪的岚三十郎座首次演出,仲达和诸葛亮孔明好像登场了”^{③5}。“自享保年后,净琉璃中便逐渐开始引用三国故事展开创作。”^{③6}平田澄子指出:“在以歌舞戏曲形式创作的《三国志》中,仲达及孔明的妻子也开始活跃在舞台之中。”^{③7}如在《诸葛亮孔

明鼎军谈》^③第二幕中便专设两位三国女性,司马仲达之妻金丝莲与诸葛亮之妻玉芙蓉登台表演。在第三幕中,日本作家还将原版《三国演义》中第二十七回中的人物形象胡班更名为胡班玲,并在原版情节基础上将胡华与妻女会见关羽的故事情节改编成了胡华之子胡班之妻园式与女儿兰奢会见关羽的舞台情节,以此凸显日本戏曲艺术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刻画。此外在歌舞伎戏曲的创作中,也开始对三国故事中的忠义人物有所关注,尤其是对关羽形象的描绘。如 1735 年的歌舞伎《瑞树太平记》、1742 年的《东山殿旭扇》,1832 年创作的《歌舞伎十八番》的第六个剧目“关羽”中,便借三国人物关羽形象在日本的转世隐喻了“日本武将景清”^④的除恶扬善行为。

此外,三国文化还被日本作家引入了读本类小说之中。江户时期的读本是一种在文字基础上配以插图的文学类型。江户时代后期,最有名的读本应属龙泽马琴在 1814 年至 1842 年间出版的《南总里见八犬》。在作品中,龙泽马琴便借鉴《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场景展开了改写。如将三国故事中长坂坡事件改写成成长阪桥之战,《三国演义》中描写道:“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⑤《南总里见八犬》中则改写为:“各队士兵,总计四万多大军,来到长阪川附近。”“有个身穿铠甲的武士骑在马上,面向这边端然不动。”“那现八单人独骑在那里想引诱我之大军,必然是计。”^⑥此外,龙泽马琴在创作中还借三国人物的忠义形象隐喻了日本武士的忠义思想,如“然而政德不能施于全国,却是得到如八犬士这样贤良心腹之臣的吉兆”,“但其仁义忠信无人能及。同时又有诸葛亮、庞统、法正、费祋、蒋琬、马良、姜维等贤良忠义之臣辅佐”等。^⑦

此时期日本小说及戏曲的创作在保留《三国演义》部分情节的基础上,以情节改写或人物形象借用等方式对原版《三国演义》中的内容进行了文化融合,为后期日本三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文学基础。

3. 明治维新时期

三国文化在日本传播的第三个关键期是明治维新时期,即日本文学的近代时期(1868—1925 年)。此时期日本作家多借三国历史喻日本的时代变革。自 1868 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三国故事再次成为日

本作家关注的内容。诗歌方面,土井晚翠于 1896 年以三国故事为背景创作了叙事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诗中借三国的时代背景及诸葛亮的生平事迹隐喻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革,如“当年三顾遥堪念,知遇深情今复现,君恩笃厚终无变”^⑧。在小说方面,内藤湖南在 1897 年出版的《诸葛武侯》一书中,不仅借三国故事讽喻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变革,还借三国人物中的贤才形象传达了内藤湖南对日本贤才的渴求之情。如“三国,千古罕觐之奇局也;武侯,千古间出之奇才也”,“又,其数顾而始得与语,亦非武侯迥异于当时士子热衷功名达乎”^⑨。自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作家借三国文化展开创作时已不再是对三国故事题材的改写,而是转向对三国时代背景及三国美学等内容的关注。

4. 现代文学时期

三国文化在日本嬗变的第四个时期,即日本现代文学时期(约 1926 年至今)。这一时期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故事题材及形式已不能满足日本民众的需求,因此日本作家开始将三国文化与日本大众文学结合,并最终促成了日本三国文化的成熟。在小说创作方面,以吉川英治为首的日本作家群开始将三国文化与报纸媒介结合,以连载的形式展开创作。如吉川英治在 1927 年创作的《江户三国志》,以及其在 1939 年至 1943 年间刊载在《中外商业新报》上的《三国志》等作品。在《三国志》中,吉川英治在保留部分三国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三国人物曹操等的传统形象进行了改造。吉川英治剔除了原版《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奸雄气质的刻画,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改造成了胸怀大略的雅士形象,如“曹操头脑机智,胸怀广阔”,“曹操虽身临险境,却依旧具有凛然之气从而显现出了他的坚韧”^⑩。在漫画创作方面,1974 年横山光辉开始将三国文化与视觉文本结合,创作了漫画版《三国志》^⑪。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伴随电媒技术及影视文学的发展,日本作家再次将三国文化与影像技术结合进行创作。1982 年川本喜八郎以影视动画的形式制作了 26 集的日本人人形剧《三国志》^⑫。在人人形剧中,川本喜八郎不仅借用了《三国演义》中的部分故事情节,还将京剧三国戏中的铠甲、冠帽、官靴、女士发髻等元素引入日本人人形剧场景之中,丰富了日本三国文化人人形剧影视文学的内容。1991 年至 1994 年间,信浓企画将《通

俗三国志》改编成了47集动画版《横山光辉三国志》^④。在网络游戏方面,1985年日本游戏开发商KOEI集团借三国文化中的故事背景及人物形象发布了首款网游版《三国志I》^⑤,至2020年网游版《三国志》已成功发布到第十四代。KOEI集团在《三国志》游戏的设置环节中依据三国时代背景及故事场景等对游戏中的战争背景、城池分布及人物形象进行了设计。

三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业及企业管理层面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伴随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旅游业也开始借三国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发展日本特色旅游项目。在日本秋田地区每年八月三日至六日举行的竿灯祭中,便将《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中的点灯情节与秋田旅游产业结合,用“来自中国《三国志》《水浒传》等的武将征战图”^⑥对竿灯形象进行设计。此外日本企业管理行业也将三国文化中展现君臣谋略的内容引入了日本企业管理领域,相继出版了多部书籍,如村上政彦2008年出版的《向〈三国〉学习领导作风》^⑦、2010年出版的《向〈三国〉学习胜利方法》^⑧,宇山卓荣2017年出版的《看〈三国〉领导艺术》^⑨等。这说明,三国文化经日本现代文学的改造,已嬗变成符合日本审美特征的三国文化形态及内涵。

三、日本三国文化嬗变的特点

纵观三国文化在日本四个时期的创作与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在继承中国三国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国三国文化中的思想内涵与日本民族传统美学及文学形式不断结合,最终促成了日本三国文化的发展。

第一,日本三国文化在继承中国三国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结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三国文化观。14世纪日本军事物语小说《太平记》中便多次借用三国故事情节及三国人物诸葛亮等形象描绘日本武士的忠、义思想。《太平记》以日本南北朝时代为背景,描写了日本1318年至1368年长达50年的战乱历史。田中尚子指出:“《太平记》如《三国志》一样尤其重视‘智’和‘君臣关系’。”^⑩而忠、义便是君臣关系中的两个层面。忠意味臣子忠于人民、忠于天子;义则代表君子之义为民为国。日本武士道精神兴起于9世纪,在各时期的发展中又略有不同。在日本中世时

期,即14世纪左右,武士道精神主要注重武士的忠君思想,即武士阶层对君王的绝对服从。诸葛亮作为三国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忠、义行为备受关注。日本作家创作的《太平记》中便出现了借三国人物诸葛亮比喻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场景,即借诸葛亮的忠君思想比喻日本楠木正成的武士道精神。据《太平记》卷二十记载:“故此吾首悬暴狱门,天下存志者失力,武家无所惧。即云‘死孔明走生仲达’之事。”^⑪楠木正成去世后,《太平记》中也再次将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改写成了对日本武士楠木正成的评价:“死于正道,有功于朝廷,从古至今无人能比正成。”^⑫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幕府政府颁布了“以儒治国”的思想策略,武士阶层更加注重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取与借鉴。江户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借三国人物比喻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作品,如在日本歌舞伎中,便出现了借三国人物关羽隐喻日本武士忠、义、勇思想的戏曲。在1832年的《歌舞伎十八番》第六个剧目“关羽”中,日本武将景清便自喻为“我乃关羽,字云长,今日在日本显灵,要抓奸邪谄媚之辈”^⑬。可见日本作家在借鉴吸取中国三国文化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结合,最终形成了更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第二,日本三国文化在继承中国三国文化兵家谋略思想的基础上,将三国文化的兵家谋略思想与日本军事物语小说及企业管理策略不断结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三国文化思想。三国故事中的兵家谋略思想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多样化战争叙事场景的描绘,第二对兵家军事谋略思想的展现。自1692年湖南文山版《通俗三国志》出版后,日本国内的诸多读本都开始借鉴三国故事的战争场景展开创作。如龙泽马琴在1814年至1842年出版的读本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中,便对《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中的水战场景进行了借用。据《三国演义》中记载:“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待至日高雾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⑭《南总里见八犬》中记载:“矢弹犹如雨点儿和冰雹一般。”“次日清晨从草人身上取下二三万枝箭;又把草人拆开从里边取出枪弹二三斗。”^⑮内藤湖南在1897年出版的《诸葛武侯》上卷第四章中也对三国故事中赤壁之战的场景展开了描绘:“且说孙刘二军,与曹军遇于赤壁。时曹军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曹军失利,引次江北,孙刘之军,在南岸。”^⑯在

日本作家创作的作品中也不乏对三国故事中具军事谋略思想人物的借用。自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在日本军事类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借三国人物中谋臣形象开展创作的作家。内藤湖南在其《诸葛武侯》中便借诸葛亮形象隐喻了自己对贤臣的渴望,如“让贤荐能,在位者之常戒。吐哺握发,以待天下之士”^①。土井晚翠在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中也借三国人物诸葛亮的事迹隐喻了自己对日本谋臣贤士的渴求之情,如“妙算世间无复比,兼仁兼智矛锋利。擒纵南夷几度惊,对君崇敬唤‘神明’”,“敌军防据有谁来?彼亦中原一奇才。将略兵韬深复密,对君莫展一筹开”^②。现代以来,日本又将三国文化的兵家谋略思想引入日本企业管理中,相继出版了多部管理类著作,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兵法经营管理学派”。如村上政彦的《向〈三国〉学习胜利方法》^③,宇山卓荣的《看〈三国〉领导艺术》^④等。

第三,日本三国文化在借鉴中国三国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与日本物哀情怀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哀感类小说作品。自日本近代文学开始,日本作家便开始借三国美学思想抒发自我物哀情怀,由此促成了一批“哀感文学”^⑤作品的出现。日本的物哀情怀大致可分三个层面,“对人的感动、对自然的感动以及对世相的感动”^⑥。第一个层面关注对自然之物哀,第二个层面关注对人之物哀,第三个层面则关注世相之物哀。物哀作为日本民族传统美学观念,多指由客观事物所引发的人的主观感触,包括哀伤、吝惜等各类情感。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在《三国志》中便借三国故事场景中的乱世背景抒发了自己对自然之物哀,“后汉建宁元年。距今一千七百八十年前”,有“一人抱膝独坐草丛中。悠悠流水——微风拂鬓。八月秋凉。黄河畔边断崖之上”^⑦。在日本近代文学时期,日本作家更关注借三国人物美学抒发自我对人物层的物哀之情。土井晚翠在叙事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中写道:“亦觉此中秋色寒。银甲坚披自整然,却将侍卫面容观,透满忧愁无际端。可怜丞相病危笃!”^⑧土井晚翠在诗歌作品中便借三国人物诸葛亮的事迹抒发了自我对贤才的物哀之情。三国故事的乱世背景也时常给人一种世事难料之悲情,因此日本作家在创作时也常借三国时代背景抒发自我对世相层的物哀之情。内藤湖南在《诸葛武侯》中写道:“吐哺握发,以天下士待之,亦何难之有。”“且观今日之所谓元勋诸老者,其

间亦不乏庸劣之辈。”“世运之转移,其治平之日,大抵以每三五十年为一期。”^⑨日本作家在吸收三国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将三国美学与日本物哀情怀不断结合,最终创作出了更具日本民族特色及时代特征的哀感类文学作品。

四、结语

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虽历经多个时代,却依旧经久不衰。自大化改革开始,日本天皇便派遣遣隋使及遣唐使等引入中国典籍。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加强中央集权也引入中国史学及文学典籍,推崇中国儒家思想。而此时期《三国演义》在日本的传入,也丰富了日本民间文学的创作题材,促进了三国文化与日本民间艺术形式的结合。明治维新后,日本作家将三国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与日本物哀情怀结合,创作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物哀文学。自日本现代文学时期开始,伴随大众文学的出现,日本作家再次将三国文化与影视文学、文化产业及企业管理等结合起来,促成了日本独特的三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三国文化在传入日本的一千多年间,在不断地流传与嬗变之中,丰富了日本文学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日本文学的美学思想,并促成了日本三国文化在各领域的成熟。

注释

①沈伯俊:《1999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段江丽:《中川谕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日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系列之二》,《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②如王文光、徐媛媛依据《三国志》史书记载,从历史人类学视角出发对史书中记载的三国时期倭人历史的探讨,王文光、徐媛媛:《三国时期倭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又如李春青依据《三国演义》文学典籍对其历史题材创作与历史真实性边界问题的关注,李春青:《〈三国演义〉的启示——谈谈历史题材创作的“边界”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近些年伴随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向,学者们越发注重从文化视角出发对三国文化发展路径展开探索,如高燕、梅铮铮对三国文化中成都市旅游景观蜀地三国文化遗存建筑武侯祠、都江堰、万里桥等的讨论,高燕、梅铮铮:《论诸葛亮在蜀地的影响——以成都诸葛亮有关三国文化遗存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2期。又如朱伟明与孙向锋依据三国文化中关公形象及其戏曲化表现形式对蜀汉遗迹与川剧三国戏的文化传播演变的讨论。朱伟明、孙向锋:《关公戏与三国文化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③④⑤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⑥⑦房玄龄:《晋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94、3页。⑧赵昌平:《李白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

出版社,2012年,第68页。⑧吴在庆:《杜牧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⑨萧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页。⑩丁锡根:《宋元平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39—885页。⑪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1页。⑫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⑬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第495页。⑭谢柏梁:《中华戏曲剧本集萃元杂剧卷之关汉卿篇》,中国戏曲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⑮沈伯俊:《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⑯罗贯中:《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毛宗岗评,岳麓书社,2005年,第363页。⑰李贽:《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第118页。⑱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8页。⑲坂本太郎、井上光贞、家永三郎、大野晋:《日本书纪》,岩波书店,1994年,第630页。⑳刘昉等:《旧唐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2—3406页。㉑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现藏于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古籍数字目录数据库文华馆,图像版第16张。㉒铃木登美惠:《太平记成立年代历考察》,《中世文学》1976年第10期。㉓邱岭、吴芳龄:《三国演义在日本》,宁夏出版社,2006年,第3页。㉔㉕㉖后藤丹治:《太平记》,冈见正雄校,岩波书店,1962年,第153、315、177页。㉗田中尚子:《三国志享受史论考》,汲古书院,2007年,第173页。㉘德田武:《本邦最初の〈三国演义〉翻译》,《明治大学教养论集》2001年第340卷。㉙井上泰山:《日本人と〈三国志演義〉—江戸時代を中心として—》,《关西大学中国文学纪要》2008年第3期。㉚鸟居清满:《画解三国志》,1760年画刊,现藏于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东洋文库。㉛睦酒亭老人作:《绘本三鼎倭孔明》全三册,1803年画刊,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㉜葛饰戴斗:《绘本通俗三国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0—201页。㉝上田望:《日本の〈三国志演義〉鑑賞(前篇)——以翻譯與插图为中心》,《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2006年第9期。㉞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三国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四方美智子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期。㉟鸟居文子:《中国的素材日本演劇化——〈三国志演義〉浄瑠璃》,《东京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纪要》1998年第59卷。㊱平田澄子:《竹本座浄瑠璃集之解題》,国书刊行会,1988年,第408页。㊲国立剧场艺能调查室编:《浄瑠璃作品要説4 竹田出云篇》,《国立剧场》1986年第2期。㊳河竹繁俊、见玉竜一:《歌舞伎十八番》,杂谈社,2019年,第89页。㊴㊵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8、265页。㊶㊷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四》,李树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9、575页。㊸㊹巧松浦友久、加藤阿下:《诗歌三国志》,金中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51—52、51页。㊺㊻㊼内藤湖南:《诸葛武侯》,张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1、65、40—41页。㊽吉川英治:《三国志3》,讲谈社,1989年,第168—388页。㊾横山光辉:《三国志》60册,东立社,1995年。㊿川本喜八郎:《三国志百態》,有限公司,1984年。㊽横山光辉《三国志》于1991年10月在日本首播,共47集。㊽《三国志I》游戏最早由日本光荣株式会社于1985年12月发布。㊽杨银平:《日本东北三大传统节日》,《日语知识》2005年第9期。㊽村上政彦:《三国志にふり—ゲー学》,潮出版社,2008年。㊽㊽村上政彦:《三国志に学ぶ:胜利学》,潮出版社,2010年。㊽㊽宇山卓荣:《〈三国志〉からり—ゲーの生き方を学ぶ》,三笠书房,2017年。㊽田中尚子:《〈太平記〉における〈三国志〉の享受》,《和汉比较文学》1999年第1期。㊽㊽兵藤裕己校注:《太平记》第一册,岩波书店,2015年,第177、81—82页。㊽河竹繁俊:《歌舞伎十八番—研究と作品》,礼国社,1994年,第1—82页。㊽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四》,李树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7页。㊽花田清輝:《随筆三国志》,第三文明社,1990年,第95页。㊽栾栋:《中日哀感文学之启示》,《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㊽张锦:《以悲为美?——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外语学刊》2016年第5期。㊽吉川英治:《三国志1》,讲谈社,1995年,第11—12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Spread and Transmutation of Three Kingdoms' Culture in Japan

Fan Ning

Abstract: During Japan's Taika-Reform period, the history and stories of Chinese Three Kingdoms were introduced into Japan. Most of them were historical translation materials. During the Japan's Edo perio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content,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was formed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Then more diversified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even cultural industry elements were added to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in Japan. Although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Japanese culture and separated from its original form, changing constantly, it is still intertwined with Chines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in cultural thoughts and aesthetics aspects.

Key Words: Japanes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